

阿富汗的国家建构何以失败？

说到阿富汗，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恐怕是战火、恐怖袭击、贫困、落后。没错，这确实是个非常悲剧的国家。阅读阿富汗史的时候，我发现一个有趣的对比。对于我们中国人，整个20世纪，1978年之前，生活是颇为动荡的，但是1978年之后，过去四十多年，生活大体而言不断改善。而阿富汗的经历刚好相反，在整个20世纪，1978年之前，他们的生活是大体平静的，连一战、二战都没有卷入。很多人可能在网上看到过一些6、70年代喀布尔的照片，那时候的喀布尔街道秩序井然，女性时尚现代，整个国家朝气蓬勃，但是1978年之后，一切都急转直下，40年来，阿富汗再也没有目睹过真正的和平。

1978年，阿富汗发生了什么？一场政变。在这场被称为“沙尔革命”的政变中，极左的人民民主党推翻了达伍德政府，建立了一个激进左翼政权，从此开启了阿富汗的噩梦模式。这里需要交代一下，达伍德1973年也是通过政变上台的，当时，他认为王室过于保守，而他希望推动更加左翼的社会变革，所以推翻了阿富汗王室，建立了阿富汗共和国。结果5年之后，他本人又被更左翼的人民民主党推翻，结局可以说非常讽刺。

1978年沙尔革命后，人民民主党上台，开始推行更激进的改革，但是，没想到阿富汗人民并不领情，进行了激烈的反抗。新政权很快挺不住了，于是向苏联求援。1979年，苏军开着坦克就进来了，战争由此开始：一边是政府及其后台苏军，一边则是武装民众。本来，根本没有什么军事训练的民众，怎么可能打得过苏联的飞机大炮？但是，适逢冷战高峰，阿富汗的武装民众背后涌现出一批热情的大哥：美国、巴基斯坦和沙特。也正是在这时候，本拉登毅然抛弃了他在沙特的富豪生活，作为一个国际主义战士，来到了阿富汗。所以，在他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之前，他确实曾是美国的亲密战友。于是，在所有这些力量的搅和下，一场本来可能短平快的军事行动演变成了一场长达十年的噩梦。1989年苏东巨变，苏联撤军，事实证明，苏联的入侵是一个悲剧，苏联的撤退则是一个更大的悲剧。苏军撤离后，苏联支持的纳吉布拉政府勉强挣扎了3年，于1992年垮台。本来，这是阿富汗结束战争、回归常态的机会。事实上，苏联倒台、冷战结束后，有一批陷入左右内战的国家都陆续结束了内战，毕竟，老大哥都不在了，小弟们也不用再打了。但是，阿富汗却回不去了。1992到1996年，当初共同抵抗苏联的武装组织开始相互厮杀。如果和苏联的战斗只是摧毁了半个阿富汗，苏联撤离后的内战，则摧毁了另外半个阿富汗。也是在这个阶段，喀布尔被打回了石器时代。

混乱的内战，最后的确产生了一个最终的胜利者，只不过，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胜利者，而是奇葩的塔利班。本来，凶残如塔利班，即使不能构建一个美好的国家，也能构建一个有效的国家，但是，因为塔利班太奇葩了，各种倒行逆施，导致原先相互厮杀的小伙伴们纷纷团结起来与它对抗，这就是著名的“北方联军”。因此，即使塔利班上台，阿富汗内战还在继续，直到2001年塔利班被美军推翻。据估算，1978年到2001年，阿富汗大约有100-200万人战死，有400万人逃亡到巴基斯坦和伊朗，还有数百人在国内流离失所。对于一个总人口3000万左右的国家，这是难以想象的人间惨剧。

2001年美军入侵，一度被视为阿富汗的转机。然而，正如20年前的苏联，美军也逐渐发现，自己踏入了一个难以醒来的噩梦。2001年，全世界都认为美军已经赶跑了塔利班，但是很快，塔利班卷土重来，到2019年，政府只控制着35%的领土，塔利班占领了阿富汗13%的土地，而另外一半的领土上双方展开拉锯战。

与此同时，因为安全局势的恶化，其它所有的治理维度都不可能真正改善。到2020年，阿富汗的贫困率高达人口的一半，鸦片成为阿富汗的支柱性产业，10%的人口吸毒，80%的阿富汗人表示害怕在境内旅行，2/3的人表示害怕投票。为什么害怕投票？因为塔利班屡次袭击投票站。阿富汗政府软弱无力的一个几乎是羞辱性的证明，是特朗普规划美军完全撤离的方案时，其谈判对象是塔利班，而不是阿富汗政府。事实上，塔利班和美国谈判的条件之一，就是不许阿富汗政府参加谈判。一个连“上桌吃饭”的权利都被剥夺的政府，谈何国家能力。

所以，回顾阿富汗的当代简史，我们发现，阿富汗过去40年的灾难延绵不绝，在所有可能逃离灾难的出口，阿富汗都错过了。注意，在我刚才描述的简史中，不是某一个政府、或者某一个政体难以建构暴力垄断的

国家，而是任何政府、任何政体都难以建构国家。大家想想，过去40余年，阿富汗尝试过君主立宪、威权共和、极左政权、神权政治、美式民主以及无政府，可以说神农尝百草一样尝试了所有可能的政体，但是，在所有这些政体实验中，国家建构全都失败了。我们可能都听说过一个说法，把阿富汗叫做“帝国的坟场”，其实，阿富汗岂止是“帝国的坟场”，也是“制度的坟场”。

但也正是因为阿富汗的国家建构如此失败，也给了我们一个理论窗口，去观察国家建构的各种阻碍性因素。为什么阿富汗的国家建构如此之难？在我看来，至少有四个因素。对这四个因素的分析，或许也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其它“失败国家”的失败原因。

首先是地理条件。大家不要觉得，自然和政治没有什么关系，关系非常之大。在比较政治学的内战研究中，许多研究都会把“多山与否”作为一个变量来分析。为什么？因为多山意味着政府触角的限度，也意味着叛军容易找到藏身之所。阿富汗就是一个多山的国家。可以看出，这是一个几乎完全被山地覆盖的国家，人类只是聚居在山间的峡谷地带而已。可以想象，在这种地形地势中，在交通通讯不发达的时代，不同社区之间交往是非常困难的，建立大一统的中央政府更是困难重重，因为这种地貌，出门买个菜看上去都像去西天取经一样困难。

所以，自古以来，阿富汗的政治传统就是部落长老式的自治。直到1747年，阿富汗才建立了以当地人认同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式国家，这也就是延续了200多年，1973年被达伍德推翻的杜兰尼王朝。大家注意，1747年，这在中国已经是乾隆年间了，是中华王朝帝国的尾声了。但是，对于阿富汗，这时候它的国家建构才刚刚开始。即使是杜兰尼王朝，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间接统治，王室所真正控制的，仅仅是几个大城市而已，其它地方，主要还是各部落长老说了算。

所以，把阿富汗叫做“帝国的坟场”，听上去似乎阿富汗人多么厉害，仔细想想，其实阿富汗最厉害的不是他们的人，而是他们的山。我们都知道，1842年，英国在中国打赢了鸦片战争，但是同一年，大英帝国在阿富汗却遭遇了惨败。为什么？因为海战是英国的长项，而在山上打游击，英国人不会啊。最后，在阿富汗冬天的群山之中，上万英国人冻死的冻死，饿死的饿死。后来1979年苏军入侵、2001年美军入侵，也是发现，他们的武器再先进，面对这种延绵不绝的山脉难以发挥威力。道理很简单：你根本找不到敌人。这些游击队员在山里钻来钻去，出则为战士，退则为农民，没什么军人和平民的分野，你炸来炸去就是炸石头而已。问题在于，这种让帝国征服变得很困难的地理因素，同样也让国家建构变得很困难。它是“帝国的坟场”，也是“国家的坟场”。

东南方向则是印度以及一度占领印度大英帝国。因为地处这些大国的交界地带，所以很自然地，它就成为大国征战的通道。这就像张三和李四打架，可怜的小明偏偏住在他们两家中间，谁也不招惹，家里却总是被砸得稀巴烂。我们之前说，战争缔造国家，但问题在于，在阿富汗的背景下，战争往往是国代理战争，每一股势力本质上都是靠外力支撑，这种战争是无法真正完成构建国家的。为什么？这就有点像骑车。骑车是锻炼身体的，但是如果你骑的是电动车，不是自主发力，而是靠电池发力，那么骑的再远也锻炼不了身体。

更糟的是，因为代理战争，所以战争怎么打也打不完，打不到暴力垄断的格局。本来阿富汗这样一个小国，内战很容易打完，决出胜负之后就实现暴力垄断了。但问题是，身处大国的包围圈，这些外国势力不让你打完。这边阿富汗人民民主党1979年快倒了，苏联开着坦克进来了，帮它续命。在苏联的帮助下，人民民主党本来可以搞定阿富汗，但是美国、沙特和巴基斯坦又进来了，帮圣战战士续命。1996年，塔利班已经建立政权了，但是美军又开着飞机过来了，赶跑了塔利班。2001年塔利班已经被赶跑了，一个准民主政体建立了，巴基斯坦那边的极端分子又打开了怀抱，又开始给塔利班续命。所以，本来可能三、五年能打完的内战，因为这些外部势力的干预，就变得没完没了，怎么也打不到句号。大家想想，如果当年秦统一六国的时候，刚要打赢，一会儿罗马帝国突然跑出来扶持韩魏赵，一会儿波斯帝国跑来扶持吴楚越，秦国的建国大业是不是就变得遥遥无期？幸亏罗马帝国、波斯帝国离得太远了，所以战争能打上句号。所以，地缘因素，是阿富汗国家建构的第二个障碍。

第三个障碍，是宗教。确切地说，是伊斯兰极端主义。其实，历史上，阿富汗并不是一个宗教极端主义的国家。但是，两股力量的对撞，在阿富汗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。第一股力量，是苏军入侵。苏军入侵后，本来一盘散沙的阿富汗立刻爆发出空前的宗教热情，因为宗教是唯一能把不同族群团结起来的力量。所有反抗组织都自称为Mujihadeen，“圣战战士”。可以说，阿富汗的宗教热情真的是被苏联捅马蜂窝捅出来的。

但是，如果没有另一股势力，这些圣战组织虽然有宗教名目，但本质上也只是军事力量，它们只是想赶跑苏军，未必想用“宗教理想国”来改造阿富汗社会。另一股力量是什么？是萨拉菲主义。什么是萨拉菲主义？简单来说，就是一种极端保守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。它本来只是在沙特阿拉伯比较活跃，但是从1960年代开始，发了石油财的沙特开始向全世界推广这种原教旨主义，到1970年代末期，萨拉菲主义开始在巴基斯坦形成势力。

塔利班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“学生”。为什么叫“学生”？因为他们真的就是宗教学校的学生。所以，当塔利班征服阿富汗，他们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按照他们学过的教科书，实施一种极端保守的伊斯兰法。当时，感到震惊的不仅仅是全世界，也包括阿富汗社会自身——因为对阿富汗人来说，塔利班并不代表阿富汗本土的文化，它也是一种陌生的“外来势力”，一种由沙特、巴基斯坦传入的“进口文化”。

塔利班上台后，其所作所为为大家可能多少都听说过：把已经进入职场和学校的女性重新赶回家门、强迫所有的女性蒙面、禁止音乐、电影和娱乐，炸毁了巴米扬大佛，恢复了很多伊斯兰教中古老的刑罚，比如用砍手来惩罚盗窃，用石头砸同性恋，公开虐待和处决罪犯。听众朋友中可能有人读过《追风筝的人》，里面就说到，塔利班连风筝都给禁了。如果不是这种“进口的”宗教极端主义，90年代的阿富汗本有可能回到1978年之前的样子，但是，阿富汗再也回不去了。

尽管塔利班2001年被推翻，但是塑造了它、以及它所塑造的极端主义文化，却开始浸润阿富汗的土壤，有可能在几代人之间，都不会完全消失。2013年皮尤中心有个民意调查，其中一个问题，是询问穆斯林对自杀袭击的看法，阿富汗人中表示“自杀袭击常常或有时是正当的”的比例高达39%，几乎是所有被调查国家中最高的。另一项民调中，当问及政治和宗教是否应该分离时，57%的阿富汗人表示不应该，宗教领袖应当介入政治。此类数字不仅仅是数字，它会转化为真实的悲剧。

2001年后，这种宗教极端主义的力量，成为阿富汗国家建构最大的障碍。我们可能会觉得，为什么塔利班一定要和政府打？他们就不能坐下来好好谈谈，就像南非当年一样，实现权力分享吗？答案是：不能。至少，如果现在的塔利班还是过去的塔利班，答案就是“不能”。为什么？因为宗教原教旨主义带来的意识形态刚性。在他们的观念体系中，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法必须成为国土上唯一的和最高的法，而人类所能制定的法——不管是国王制定的、还是所谓民主议会制定的，只能屈服于伊斯兰法。这种情况下，他们怎么接受与政治世俗派分享权力？纯粹的权力之争可以讨价还价，但是你死我活的观念之争却没有商量余地。

妨碍阿富汗国家建构的第四个障碍，则是民族主义。对于国家建构而言，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，它曾经是许多单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动力，但是，对多民族国家来说，民族主义又往往是国家建构的离心力。比如，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造就了克罗地亚这个国家，但是对其原先的母国南斯拉夫来说，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就是一种离心力。希腊的民族主义使其摆脱了奥斯曼帝国，成就了现代希腊，但是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，希腊的民族主义显然是国家建构的绊脚石。

阿富汗是个地地道道的多民族国家。文稿中可以看到阿富汗大致的族群分布(图7)：普什图族是最大的族群，占人口大约40%；第二大族群是塔吉克人，占大约25%；哈扎拉人，10%左右，乌兹别克人，10%。此外还有俾路支人、土库曼人，等等。这种碎片化的族群格局，显然是大一统政治的障碍。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，则是这些民族周边，都有其族群的大本营国家。比如，阿富汗虽然只有1500万普什图人，但是在国界线的南边，巴基斯坦有3500万左右普什图人，相当于一个势力强大的娘家就住在隔壁。以此类推，塔吉克人受到塔吉克斯坦的支持，什叶派的哈扎拉人受到伊朗的支持。

这种情况下，任何族群想要吃掉其它族群，都往往望而却步。

其实，现代史上，阿富汗的民族主义并不严重，没有显著的分离主义运动。部分原因在于，多山地形以及由此形成的部落主义传统，不但消解了帝国、消解了国家，甚至消解了民族。我就是某某村的，“民族”是什么？还是太抽象了、太宏大了。但是，1979年苏军入侵，不但动员出了阿富汗人的宗教热情，也动员出了他们的民族热情。原因很简单，以民族为基础进行军事动员，最有效率。

所以，我们看到，在苏军占领期间，虽然阿富汗几乎全民抵抗，但是抵抗的力量却是分片包干的。塔吉克人由著名的“北方雄狮”马苏德领导；乌兹别克人靠Dostam领导；普什图人最后大体聚集到了Hekmatyar手下；哈扎拉人也在自己的领地上抗战。这种“包干区”式的抵抗有其严重后果，那就是苏联被赶跑后，他们内部就开始为“胜利果实如何分配”的问题而大打出手。这就有点像国共合作打日本，日本一跑，国共自己就打起来了。只不过，在40年代的中国，内战是两军对垒，但是1989年之后的阿富汗，可不止两股势力，而是四、五股势力。这种情况下，要达成和平协议太难了，因为否决点太多，只要一方不合作，其它三、四方好不容易达成的协议就会被作废。也正是这种碎片化的状态，给了塔利班可乘之机。

今天，塔利班能够卷土重来，也和普什图人的民族主义相关。塔利班从普什图地区起家，其成员主要是普什图族，其藏身之处也主要在普什图地区。有民调显示，尽管在整个阿富汗，塔利班的同情者到2019年只有15%左右，但是在部分普什图省份，这个比例可以高达50%左右。正是普什图族提供的这种人员、物资、安全乃至心理支持系统，使得塔利班能够在最艰难的时刻保持存活下来并东山再起。

所以，回顾阿富汗的国家建构进程为何如此困难重重，我们发现至少四重因素：第一，多山的地形使得中央集权式政府难以形成，造就了部落主义的政治传统；第二，大国对冲的地缘位置则使得内战往往成为大国代理战争，战争难以打出胜负，任何暴力垄断格局难以形成；第三，苏联入侵激起的宗教狂热主义毒化了阿富汗的文化土壤，使得世俗政治力量难以建立；第四，多民族国家的结构，又使得各方政治力量难以就权力分配的方案达成共识。

阿富汗的困境也帮助我们分析其它国家的国家建构瓶颈。无论是特定的地形地势、地缘环境，还是宗教极端主义以及民族主义，都广泛存在于许多其它国家，阿富汗的不幸在于，它把这些因素合而为一，也因此沦落为当今世界上最顽固的“失败国家”之一。

不过，阿富汗的国家建构真的完全无可救药吗？也未必。阿富汗自己1978年之前长达半个世纪的相对和平稳定，就是这种可能性的证明。特定的地理因素虽然使中央集权式国家难以形成，但是部落自治的治理结构也未必不可行。仔细分析，让阿富汗跌入今天这个漩涡的，主要不是静态的地理因素，而是两种极端主义的对撞：苏联式的极左主义，以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。

这两种极端主义看似南辕北辙，在一点上却彼此相似，那就是它们“改造世界”的狂热，那种用理性主义、用纯净的道德理想、用原教旨去重新书写历史的热情。这种冲动摧毁了阿富汗原有的政治秩序，却发现在人心面前，暴力会抵达它的限度。很多国家都经历过极左主义或者宗教原教旨主义，但是把这两者在短时间内都经历一遍的国家，却似乎只有阿富汗，简直相当于一个人被两辆卡车分别碾压了一遍。更糟的是，这两种力量在阿富汗发生了遭遇战。关于这场遭遇战，有个学者的比喻让我印象非常深刻，他说，苏军入侵后，宗教极端主义的兴起，就像是阿富汗面对病毒入侵时的免疫风暴——它的确杀死了病毒，但是同时也杀死了自己。所以，检视阿富汗沦为“失败国家”的过程，我们发现，最大的教训，其实是极权追求乌托邦的危险——因为乌托邦过于乌托邦，所以要实现它，只能诉诸于高度极权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极端助长极端，最终，它们在相互厮杀中完成了对彼此的哺育。其实，极端的并不是阿富汗的主流社会。2019年一项民调显示，只有15%的阿富汗人表示同情塔利班；80%的人表示支持女性权利、社会平等和自由表达。所以，阿富汗缺的不是温和的力量，缺的只是愿意为温和而战的力量。其实，岂止阿富汗面临这样的危险，在一个日渐极化的世界中，哪个国家不是如此？